

大学军事课教程

主编：骆红斌 单小忠 苗志良

浙江文艺出版社

E 0
33

大学军事课教程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军事课教程 / 骆红斌等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39-2180-1

I . 大… II . 骆… III . 军事科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 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054987号

大学军事课教程	
骆红斌 单小忠 苗志良 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邮：Zjlapb@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343千字 印张：16.5 插页：2 印数：00001-13000
责任编辑	鲍 娜
装帧设计	沈路纲
责任校对	孙旭明
	许红梅
	ISBN 7-5339-2180-1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言

对全日制本科生进行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是许多学校长期坚持的做法,我们视之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不可遏制的主潮,但无论是科索沃的隆隆炮声,还是阿富汗的漫漫硝烟,抑或伊拉克的熊熊战火,这一幕幕不该发生却相继发生的悲剧,都警示我们: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必须持之以恒。不仅如此,通过开展军事训练,还可以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勇敢的作风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这对他们成长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颇有助益的。

本教材由几位资深教师合作编写而成,既是其实践经验的结晶,又多方吸收军事科学的研究的最新成果,鲜明地表现出致力理论创新的意向。同时,作为一本切于实用的教材,它对课程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把握与设计是准确的,独到的。惟其如此,尽管它有待于进一步充实与完善,其特色却是令人一目了然——无疑,特色既是一部教材的学术性之所在,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全面深化教学改革的今天,“大学军事课”这门课程当然也必须不断酝酿新的改革,以期与时俱进,与日俱新。我们对本教材的几位编者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1 序言

肖瑞峰

1 第一章 中国国防

第一节 国防概述 1

第二节 新中国国防建设 8

第三节 中国国防法制 15

第四节 中国武装力量 26

33 第二章 军事思想

第一节 军事思想概述 33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思想 39

第三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54

第四节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64

73 第三章 战略环境

第一节 战略环境的概述 73

第二节 国际战略格局 82

第三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91

98 第四章 军事高技术

第一节 军事高技术概述 98

第二节 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102

132 第五章 高技术局部战争

第一节 高技术局部战争概述 132

第二节 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 135

第三节 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国防建设的要求 139

144 第六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
条令教育与训练

- 第一节 概述 144
- 第二节 《内务条令》节录 145
- 第三节 《纪律条令》节录 149
- 第四节 《队列条令》节录 150
- 第五节 阅兵 160

164 第七章 轻武器射击

- 第一节 武器常识 164
- 第二节 射击原理 170
- 第三节 射击动作 181

187 第八章 战术

- 第一节 战斗类型和战斗样式 187
- 第二节 战术基本原则 190
- 第三节 单兵战斗基本动作 193

201 第九章 军事地形学

- 第一节 地形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201
- 第二节 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206
- 第三节 现地使用地图 222

239 第十章 综合训练

- 第一节 行军 239
- 第二节 宿营与警戒 241
- 第三节 野外生存 244

259 编写说明

《大学军事课教程》编委会

第一章 中国国防

本章导读: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事关国家的兴衰、荣辱和存亡,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保障;国防的巩固和强大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计。本章主要介绍国防的含义、类型、特征和我国国防历史、新中国国防建设成就、我国国防法制、我国武装力量。

第一节 国防概述

一、国防的含义、类型及特征

[1] 国防的含义

国防是国家防务的简称。国防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国防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奉行不同政策的国家,其国防具有不同的特性。当代霸权主义国家的国防,无不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

中国则一如既往地坚持国防的防卫性质,并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

[2] 国防的基本类型

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决定了国防的性质和形式。现代国防的类型,按照性质可分为扩张型和自卫型;按照形式可分为联盟型和中立型。

扩张型

扩张型的国防奉行霸权主义政策。他们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防务需要为幌子,将其疆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纳入本国的势力范围,并对别国进行侵略、颠覆和渗透。

自卫型

自卫型的国防以防止外敌侵略为目的。在国防建设上,他们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广泛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维护本国安全,维护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联盟型

联盟型的国防为弥补自身国防力量的不足,以结盟的形式联合相关国家进行防卫。联盟型的国防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一元体系联盟,即某一大国为联盟的盟主,其余国家处于从属地位;二是多元体系联盟,即联盟诸国基本处于伙伴关系,共同协商防卫大计。

中立型

中立型的国防是指一些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的中小发达国家,为保障本国的繁荣、发展和安全,实行和平中立的国防政策。其中一些国家采取完全不设防的方式,有的则采取全民防卫式的武装中立。

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开向世界承诺: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在战略上,我国采取防御态势。我国国防建设的宗旨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在国防力量的运用上,我国坚持自卫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我国属自卫型的国防。

[3] 现代国防的基本特征

现代国防是对传统国防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国防观念和国防实践活动。现代国防又叫社会国防、大国防、全民国防,其基本特征为:

现代国防结构的多维性

现代国防构成不单指军事力量,还包括非军事力量,但以军事力量为主,不只靠国家的军事实力,还靠国家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在战时能够将战争潜力快速转化为军事实力的能力。因此,现代国防不只是军事力量的抗衡,而是诸如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生产能力、人口数量和质量、科技和文化水平、交通运输、通信状况、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等多维力量和因素的抗衡,即综合国力的抗衡。现代国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现有客观基础上,尽快增强综合国力,并有效地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国防目标。

现代国防斗争形式的多样性

现代国防的斗争形式主要包括:通过暴力对抗,即以战争手段消除威胁;通过威慑手段,即在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以各种非暴力方式,给对方造成心理震慑,使之改变意志,放弃威胁企图;通过谈判方式,使双方达成谅解,从而缓解威胁;大力发展本国力量,并通过运用各种力量,不断扩大影响,取得明显优势,使对方不敢进行威胁。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对峙的双方不经实力较量,在短期内一般较难实现自己的企图。因此,无论是影响力、谈判还是威慑,都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和基础,甚至要随时准备把实力投入战场。虽然战争手段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当今世界,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挑战,维护社会的稳定,运用影响力、谈判和威慑等非暴力手段已客观地居于国防的重要位置。现代国防也正是这多种手段、多种斗争形式的角逐。

现代国防目标的多层次性

国际政治、经济在现代国防上打下的烙印越来越深刻。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同，特别是经济利益不同，因此，所制定的战略也各有千秋，再加上各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异，就使得现代国防呈现出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从范围上看，现代国防目标可分为自卫目标、区域目标和全球目标。由于本国在国土之外的经济利益有限，加上自身实力不足，因此，只能将国防目标定位于最基本的一个层次上，即自卫目标的国防，着眼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些国家虽然在世界范围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不奉行扩张政策，或者军事实力达不到全球范围，所以，将防卫目标锁定在本国及周边区域，也就是说，区域目标国防在维护本国安全利益这个层次上再提高一步，努力为本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并扩大自卫的纵深和弹性。少数实力雄厚的国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或者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或者出于称霸世界的企图，将国防的目标对准世界，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消除战争危险，或进行侵略扩张，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

另外，还可以从内涵上对国防的目标层次进行分类。一种是基于保证国家生存、民族独立型的国防，称为生存目标；另一种是国家生存无忧，民族独立无虑，国防的目标在于争取一个适合国家发展的空间，称之为发展目标。总的来说，国防因国家性质、制度、国力及其推行的政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所有国防的着眼点都是捍卫和扩大国家利益。

二、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1] 中国古代的国防

我国古代的国防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共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锤炼，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不畏强暴、卫国御敌的尚武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疆域国家。

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从此，作为抵御外来侵犯和征伐别国的武备——国防的雏形便产生了。在随后的几千年征战中，为保家卫国，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使国防观念迅速得到强化，形成了诸如“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非诛”、“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富国强兵”、“文武相济”、“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对武备和国防的重视，而且国防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全面奠定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熟。主要体现在：首先，军事学术极为活跃。现存最早、影响最深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十多部。诸子百家的大量军事论述，共同形成了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为我国国防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此基础上也形成较为完整的战争观,并提出了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示战先算”、“伐谋伐交,不战而胜”、“以智使力”等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概括精辟,到现在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军方法,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军队编制结构;重视改善武器装备,研制出种类繁多的兵器装备,明确提出把军队的教育训练当做治军的首要任务,以此来提高部队的素质。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至唐、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繁荣时期,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开始全面整理兵书,初步形成古代军事学术体系。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形成了研究军事战略的“兵权谋”,研究战役、战术的“兵形势”,研究军事天文、气象的“兵阴阳”,研究兵器、装备的制造和运用技巧的“兵技巧”,共四大类,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学术体系。另外,战略思想趋于成熟,战略防御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宋朝至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落时期,但军事上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因此,在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上也有相当的发展,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初期采用了以文制武,将中从御,结果导致了重文轻武,国防衰落。宋仁宗时期,开办了“武学”,后又设武举,为军队培养、选拔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也繁荣了军事学术。明、清两朝将武举推向更深层次,甚至出现文人谈兵、武人弄文的局面,大量军事著作面世,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国防理论主要有:“以民为体”、“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导下,华夏大地消除了无数次外敌入侵带来的战祸,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甚至使国防曾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辉煌。

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即我们常说的军事制度,也称军制,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管理、维持、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我国古代的兵制建设主要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内容。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一般由君主亲自掌握和指挥,没有形成专门的军事领导机构。春秋末期,实现将相分权治国,以将(将军)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开始独立统兵作战。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太尉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隋朝设立了三省六部制,设兵部专门主管军事。宋朝则设置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用文官担任,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将”拥兵自重。枢密院有权调兵却无权指挥,将军有权指挥却无权调兵,形成枢密院和将军相互牵制的局面。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各有千秋,但皇权至上,军队的最终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是掌握在皇帝手中的。

在武装力量体制上,秦朝之前武装力量结构单一,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支国家的军队。从秦朝开始,国家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生产力不断发展,因而,各个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

要以及驻防地区和担负任务的具体情况,将军队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种,并对军队的编制体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军械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捕亡律》等。

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

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

在我国古代国防工程建设中,城池的建设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城池建筑最早始于商代,随后,城池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伸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建筑已经开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国防,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开始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连为一个整体,形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的宏伟工程。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12700余里的万里长城。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兴建的伟大的水利工程。隋炀帝时期,征调大量人力物力,将原有的旧河道拓宽和连贯,形成北起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成为军事交通和“南粮北运”的大动脉,具有重大的军事和经济作用。

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14世纪,倭寇频繁袭扰我国沿海地区,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为抗击倭寇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

[2] 中国近代的国防

清王朝后期兵备废置,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国防力量由盛转衰。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逐渐地处于落伍态势。首先,政治黑暗,从皇帝到大小官吏,多昏庸无能、浑浑噩噩、无所用心,其腐朽性与寄生性与日俱增。乾隆以后,官场上贪污成风,仅从贪官和珅一家没收的财产就有白银8亿两左右,相当于当时二十年的国库收入。其次,经济衰退,皇室、官僚和军队挥霍无度,财政左支右绌、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土地因兼并而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无田地耕种,极大地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军备废弛。作为清朝主要作战部队的八旗和绿营兵腐败不堪,武官克扣兵饷军粮,士兵常常扰民劫财,骑兵没有战马,水兵素来不会游泳,毫无战斗力可言。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国防能力更是衰竭到了极点。特别是在军事上,沿海

水师士兵老弱，战船多是用薄板旧钉制成，有的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三百年前的旧炮。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虽然洋务派搞了洋务运动，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先后搞起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建立了中国近代海军——南洋舰队、福建舰队和北洋舰队，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防力量衰竭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自1888年以后，慈禧太后把海军经费用于颐和园的营建，使北洋舰队停止了发展，很快落后于日舰。从此，中国屡遭外敌的侵犯和欺辱，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国家多次发动侵华战争，无不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在此期间，外国侵略者还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五百多个不平等条约。每个不平等条约都是对中国最野蛮的掠夺。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和赔款2100万两白银。随后，澳门被葡萄牙霸占；沙俄侵吞了我国东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占领了台湾及澎湖列岛；旅顺、胶州湾、广州湾等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租借地。据记载，列强对华的五百多个不平等条约，几乎都要求中方支付赔偿，少则数十万两，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蒙受了巨大屈辱和损失。

当时中国约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上，竟找不到一个中国自己享有主权的港口。国家有海无防，有边不固，绝大部分中国领土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俄国在长城以北；英国在长江流域；日本在台湾、福建；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中华民族美丽富饶的国土被蹂躏得支离破碎。到了现代，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残酷的侵华战争，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两千多万人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斗争，辛亥革命就是一场为保家卫国而战、为驱逐强虏而战的革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抗战的旗帜，领导全国人民一致抗战，驱逐日寇，随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独立的人民做主的新中国，此后我国国防才得以建立和发展。

[3] 国防历史的启示

在我国四千多年的国防历史上，有过声威远播、天下归附的武功；有过引而不发、强虏驻足的宁静；有过遍体创伤、不堪回首的屈辱；也有过抗敌卫国的巨大胜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征途中，重温这一漫长的国防历史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强大依赖经济发展，这是我国国防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国富才能兵强，自强方可自立，无不把发展经济作为巩固国防、争夺霸权的重要措施。春秋时期，晋国还是一个国贫兵弱的小国。晋文公执政后，通过整顿内政、发展经济、扩充军队等一系列的综合治理，使晋国实力急剧膨胀，先后兼并二十余国，一跃而

成为中原霸主。秦国重用商鞅进行变法,推行了“开阡陌”、“废井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秦军南征百越、北逐匈奴,最终吞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由“贞观之治”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更是当时统治者注重发展经济的结果。

与此相反,各个朝代的衰落、灭亡,遭受外敌的入侵而不能自保,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这个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结果动摇了国防的根基,使得政权易手。由此可见,只有经济的强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才能有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全。

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

国家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兴衰、国家的存亡。只有政治昌明,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保障。这是国防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又一深刻启示。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变法图强,把尊贤厚士、举贤任能、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作为强国的根本大计。汉高祖得天下后,实行“文武”政策,建立法制,修明政治。此后,文帝、景帝至武帝,都实行比较开明的治国之策。国家的昌盛,为维持西汉长达两百多年的安定局面奠定了基础。

相反,秦朝实行暴政,激起农民起义,终至推翻秦始皇梦想千秋万年、子孙相继的基业;宋朝由于机构臃肿,官员奢侈腐化,国力衰竭不堪,无力抵抗外侵,终为元兵所灭亡;明朝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政、结党营私,始被起义军所败,后又为清兵所亡。特别是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政治日趋腐朽,国防日益虚弱,面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乞降求和,割地赔款,使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将中国人民带进了苦难的深渊。

总之,国防的兴衰,王朝的更替,近代中国的百年国耻,都深刻地告诉我们,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基础,是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

我国国防史给予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就是,在面临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关头,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抵抗,才能筑起一道坚固的国防长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近代西方列强对我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山河破碎,有国无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在侵略者面前,不仅不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在义和团奋起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清朝统治者竟企图借外国侵略者之手消灭义和团。由于统治者害怕人民,采取与人民对立的立场,尽管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但都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因此无法改变战争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侵略。同时,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全国军民一道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历史证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全国军民一致共同抵抗侵略的精神和意志,才是国防的真正的钢铁长城。这是造成淹没一切侵略者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基础;这是让一切侵略者都望而生畏的真正的铜墙铁壁;这是民族自强的根本,国防力量的源泉。

第二节 新中国国防建设

一、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建设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的阶段。从1949年底至1953年,国家正处在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时期。我军继续向全国进军,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同时,还参加了建设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军入朝参战,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建设。这一时期,为使我军建设向高级阶段转变,党中央、中央军委着手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制定颁发了统一的条令条例,新建改建各类军事、政治、文化、后勤、技术院校共200余所,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教育体制。经过这段时期的努力,我军开始由长期的以单一陆军为主向合成军队过渡,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提出并开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阶段。从1953年底到1965年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的重要时期。195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是我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为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减少军人数量,提高军队质量,精兵、合成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0年至1958年,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压缩了军队规模。到1958年,军队员额总数由1950年的540万人降至240万人左右,武器装备和军队成员的现代化水平也明显提高。二是确立了诸军兵种合成的体制,建立了空军、海军和陆军各特种兵领导机构,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三是调整了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机构。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重新成立,直接领导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并几经调整,恢复和确立了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的领导体制,加强对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四是重新划分了军区。1950年大军区有6个,1955年增加至12个,1956年增加至13个。军区体制由一、二、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四级体制改为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体制,精简了机关,提高了指挥效能。五是健全了院校和科研体制。继初、中、高三级院校体制建立之后,军事科学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相继成立,军事理论和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六是统一了部队编制。

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艰难前行阶段。从1965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这一时期,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保持了军队的稳定,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始终抓住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保证了我国“两弹”试验成功和卫星发射成功。

第四阶段是实行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从而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1985年5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基本精神:一是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二是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三是从单方面强调军队建设转变到全面增强综合国力上来;四是准备对付全面战争转变为重点准备打赢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根据这一决策,全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裁军100万,进行编制体制改革,走“军民兼容”的国防发展道路,不断完善、加强战争动员体制与后备力量建设。这一时期最重要、最根本的成就,就是形成了邓小平军事理论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五阶段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的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确立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要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方针的确立,解决了新形势下我国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的宏观定向问题,是我们在战略指导上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同时,江泽民同志还围绕军队“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提出了军队建设要逐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我军质量建设的标准和途径。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五句话”总要求的指导下,围绕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我军进一步优化体制编制,组建了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兴起了学习高科技知识、开展科技大练兵的热潮,加强了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引进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装备,组建了驻港部队并顺利进驻香港,成立了“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颁布了建国后的第一部《国防法》。总的看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国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军队质量建设的步子迈得更加坚实,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二、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主要成就

[1] 建立和完善了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

我国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9日的命令,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全国武装

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并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由国家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同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作为军委的工作机关。为加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1998年,中央军委增设了总装备部。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还设有负责各军种组织建设、军事训练和战备作战的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指挥机关。此外,直接隶属中央军委的还有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等单位,以及负责指挥驻在各大战略区范围内的陆、海、空军部队和民兵的大军区领导机关。

1982年起,党和国家共同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国家的中央军委设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存在,为避免机构重叠,中共中央决定,国家军委与党的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其组成人员完全相同,而且全体军委委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党的中央军委与国家中央军委并存,同时向中央和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负责。这种体制,既贯彻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又适应我军已成为国家主要成分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体现了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的一致性。这种领导体制,便于运用国家机器来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可以使党中央对军事工作的决策、指示具有法律效力,成为国家意志;可以保证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高度集中统一。这种领导体制,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军情,坚持了党领导军队的传统,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2] 铸造了一支现代的合成军队

军队是国防力量的主体,我国根据国防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的基本承受能力,建设了一支诸军兵种相结合的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

陆军在步兵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气象兵等兵种。陆军中特种兵的数量近年来已经超过步兵,实现了建军史上的伟大转变,大大加强了陆军的火力、空击力、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增强了现代化国防的威力。陆军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海军、空军联合协同作战。1985年,陆军改编为合成集团军,使诸兵种合同作战能力和整体作战效能又有了新的增强。

我国海军以舰艇部队为主体,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兵种组成。舰艇部队日趋导弹化、电子化、自动化。舰艇普遍采用了卫星导航技术。过去的小炮舰和鱼雷艇已被国产的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快艇和各类潜艇所代替。训练舰、大型补给船、科研试验船和核动力潜艇等新型舰艇开始服役。整个海军具有在水下、水面、空中和岸上实施作战的能力,还协同其他军种进行海上作战。

我国空军以航空兵为主体,由航空兵和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空降兵、雷达兵、通信兵等兵种组成,拥有的作战飞机数量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有高空高速重型歼击机,有具有先进水平的轻型歼击机,还有布雷飞机、电子干扰飞机等,构成了航空兵和地面诸兵种合成完整的防空体系。

我国战略导弹部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建,由周总理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由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部队组成。装备多种型号战略导弹,射程从数百公里至1万多公里,威力从几十万吨到数百万吨TNT当量。可实施固定发射,也可机动发射。建有与之相配套的作战、防护工程和各种设施,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由于采用了先进可靠的制导技术,可随时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给敌方以摧毁性的还击。

在加强军队院校建设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各类军事院校在解放前有限院校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国防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进一步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全军开办了各级各类指挥院校和专业院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级指挥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着更高级的阶段迈进。根据高技术战争的特点,人民解放军开始把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面,军队建设正逐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在发展武器装备方面,人民解放军根据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努力发展高技术“撒手锏”;在改革调整体制编制方面,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压缩军队规模,优化诸军兵种比例结构,完善合成体制,使军队体制编制更能适应现代合同作战和联合作战的需要;在改革教育训练方面,为了培养掌握现代科技战争知识、精通现代军事科学理论的高层次指挥人才,指挥院校增设了硕士、博士生教育,部队训练加大了实战力度。近几年来,人民解放军多次在东海、南海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并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大规模海空实弹演习和陆海空联合作战演习。199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我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式。受阅官兵1万多名,400多辆车,组成17个徒步方队和25个机械化方队;受阅飞机编队首次由陆海空三军航空兵共同组成,由歼击机、歼击轰炸机、强击机、轰炸机、加油机、直升机等9个机种、15个机型、132架飞机编成10个空中梯队。这次阅兵展示了大量新型武器装备,既显示了国威、军威,也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新水平。

21世纪的人民解放军将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继续优化体制编制,更新教育训练内容和手段,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提高诸军兵种的合成化水平,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

[3]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防动员体制

为战时有效而迅速地展开动员,我国在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建立国防动员机构